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脱欧”公投结果的反思

□ 刘　畅

欧盟这样一个旨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以整合区域内资源，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安全等各方面实现全方位一体化的制度性努力，仍未能超脱民族国家秩序的束缚。

尽管英国“脱欧”会在一段时间内给全球化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影响，但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倡导的新型全球化则会给全世界带来很多发展上的确定性，全球化不仅不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还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更反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多元化。

6月24日，举世瞩目的英国“脱欧”公投落下帷幕。最终的结果出乎许多观察家事前的预料，有大约52%的选民将自己手中的票投给了“离开欧盟”，“脱欧”已在制度上完成了第一步。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结果呢？

“脱欧”之后英国的对欧政策模式选择

早在公投前，英国政府和一些研究机构就开始着手研究“脱欧”后英国处理同欧盟关系的可能模式和选项。根据英国外交部等方面的信息，有如下几种模式可供英国选择。

挪威模式。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冰岛或许可以为英国“脱欧”之后提供一个选项。他们虽然都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仍是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和欧洲经济区（EEA）的成员。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四大自由流通的原则基础上，EEA将上述三国完全纳入了欧盟单一市场之中，因此这样的模式可以使非欧盟成员国享有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制度自由权。在上述四大自由流通领域，非欧盟的EEA国家完全适用欧盟的法律标准，包括消费者保护和环保资质。尽管非欧盟的EEA国家由于在欧盟机构内没有正式代表而使得其对欧盟的立法进程难以施加有力影响，但它们的代表也能够参与这些立法的准备和咨询工作，并且享有向立法草案提交评论意见的权利。

行业共同体模式。以成立于2005年的欧洲能源共同体为例，它旨在协调欧盟28个成员国同其8个非欧盟成员的欧洲邻国的能源政策，以形成一个全欧范围内的统一能源市场。加入能源共同体能让英国继续获得进入欧盟内部能源市场的权利。但这要求英国采用与能源相关的欧盟法律法规，却不能对修改现有法规或制定新的法规有任何发言权。此外，这种行业共同体模式的弊端在于，其建立初衷是为了推动欧盟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建设水平较低的欧洲邻国在该特定行业领域内的政策协调，因此许多相关规则或许并不适用于英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

瑞士模式。瑞士是EFTA成员，但并非EEA成员。瑞士还在同欧盟就进入单一市场进行双边谈判，但这种一个行业部门接一个行业部门的谈判模式已经持续了20年，且有多达上百项具体的协议需要协商。然而，作为非欧盟成员国，瑞士并不自动同欧盟的法规政策和优惠待遇挂钩。此外，瑞士同欧盟之间许多双边谈判经常会受到其他行业领域谈判的干扰。因此瑞士模式对“脱欧”后的英国而言，是个费时又费劲的选项。

自贸协定/加拿大模式。这也是一种双边谈判模式。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谈了整整七年才谈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在类似CETA的模式下，英国可以同欧盟就一项深入且全面的自贸协定进行谈判，这项协定将允许额外的商品、服务和资本进入欧盟内部的单一市场，但可能不会允许人员的自由流动。但是，英国将无法再参与到欧盟的政策、规则和标准制定过程中。

无协议/WTO模式。在该模式下，英国与欧盟之间没有特定的双边协定，它们之间的贸易将只受现有的WTO规则监管。这种模式最有可能出现在特定的贸易协定谈判失败之时，或在从旧协定退出到签署新协定之间的过渡期被采用。

对欧盟而言，损失可能更严重

首先，英国“脱欧”必然意味着欧盟模式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巨大挑战。在英国的公投结果出来后不到24小时之内，欧盟多国的一些政治力量纷纷表示也要在本国举行类似公投，以决定自己国家在欧盟中的前途，如若各国真的群起效仿且结果与此次英国公投相同，那么欧洲一体化肯定会遭遇重大挫折乃至倒退。

从更深层次看，在当前反恐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欧盟对待外部移民和难民的政策，显然受到了严峻挑战。如果不思变革，则极右势力在欧洲全面接掌政权将不可避免。

其次，英国“脱欧”意味着全球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西方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俄罗斯，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将大大提升，在全球的地位也将上升。

再次，此次公投结果给欧盟最大的启示在于，欧盟这样一个旨在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以整合区域内资源，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安全等各方面实现全方位一体化的制度性努力，仍未能超脱民族国家秩序的束缚，而欧盟在推动一体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以及其扩充成员国的方式和路径，都让其陷入了同民族国家秩序的主权之争，从而使自己的努力变得无所适从。

一方面，欧盟在统一市场和共同的贸易和农业政策等方面实施的配额制度让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发达经济体成员感到遭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而涉及欧盟预算的财政政策，以及涉及区域资源整合支柱之——人员自由流动——的移民政策，又让英国等发达经济体感到被索取太多，尤其是普通民众和工薪阶层难以感受到欧盟政策的优惠与便利以及同欧盟融合的发展成果，这种逆向的政策“不平等”也让英国人对欧盟难言真爱。

另一方面，此次公投结果显示出欧盟陷入制度性困境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扩张速度太快，远超过了其资源和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尤其是2004年的东扩吸纳了经济发展水平同原有成员国相距甚大的中东欧10国，埋下了今日英国要求“脱欧”的祸根。

因此，无论结果如何，此次英国“脱欧”公投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欧盟这一区域一体化实验的限度的测试。公投结果考验不仅是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资格，更是一些更为宏观的东西，即欧盟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是否还能在未来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欧盟这个过去让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体制机制是否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这种地区一体化实验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进行。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欧盟比英国更需要反思和改革，否则它将有可能陷入无限循环的公投式“脱欧”危机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彻底失去了作为一种国际和地区合作范式的价值。

精英与大众的矛盾究竟该如何调和？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此次公投结果大出许多观察家的意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众多观察家大都是从精英的角度出发，以精英式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来进行预测。许多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和政府人士都在公投前力陈“脱欧”可能会对英国造成的种种不利影响，劝导选民不要投“脱欧”票。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大部分英国普通选民并未为精英们的再三劝导所动，这反映出公投结果的另一大启示，即精英集团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调和。

事实上，在公投之前，就有舆论认为，许多来自于精英阶层的所谓“权威言论”并不可信，这些“权威言论”总倾向于将“脱欧”视为“非理性行为选择”，但实际上，这种先入为主的预设结果式研究思路存在根本缺陷，削弱了对公投效应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因而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精英阶层习惯从宏观的角度对公投行为进行理论性分析，从而得出“非理性选择”的结论，这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里将普通民众预设为知识结构有限、认知和辨别能力较低、不易接受新事物等，归根结底还是反映出精英意识的优越性。而普通民众则倾向于从“脱欧”对自身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等直接效益角度看待问题，且对精英和政府天然抱有不信任心态和反抗精神，民主意识和选民权力观念使得他们反而更不愿意在精英阶层持续不断的“权威言论”和“好心奉劝”的信息轰炸下做“顺民”，因此此次公投结果实际上在某一方面反映出的是大部分英国民众对精英集团的反抗和切实争回属于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国家主权的行动。

此次公投结果留给英国人思考的一大问题是，当自己的国家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遭遇挫折之时，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应如何得到调和，才能防止社会被彻底撕裂。今年的“脱欧”公投不仅仅是英国“疑欧主义”情绪的周期性轮回，而且是“疑欧主义”与民粹主义对全球化进程的逆动，这种危险的民粹主义的发酵似乎反映出这样一个趋势：英国等一些曾经开启了全球化进程的传统资本主义强国在面对全球化问题冲击时愈发展现出应对能力的不足和改革转型的困难，它们在过去对自己民主制的信心正逐渐下降、忧虑在不断攀升，因而发达国家的本土民族主义情绪在上升，支持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声音在下降，这给了民粹主义绑架政治制度的机会，而它们的民主制度和国家机器在面对以极端暴力方式呈现出来的民粹主义面前，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和革新则更受考验。英国“脱欧”公投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民主制何去何从、对全球化进程又会有何影响等问题，或许是摆在英国人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面前的新课题。

全球化真的要停滞甚至倒退了吗？

公投结果出来后，有观察家认为全球化因英国退出欧盟而剧烈收缩，全球化退潮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样的观点或许有些过于悲观了。

人类至今已经历了数轮全球化，每次全球化都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强国的扩张有重大关系。而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的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商品、人员和服务全球性流动的需求。从这方面看，英国“脱欧”的确对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以资本流动和货币金融为代表的全球化有深刻影响，民族国家与全球治理体系、民族主义情绪与全球主义理念的矛盾将因英国“脱欧”而在未来较长时间中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但是，以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则表明，全球化自身也在进行新的机制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或曰核心驱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全球化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供给而进行的全球扩张，而今天的全球化则体现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全球化更为公平的权益分配而进行的努力。因此，新型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量正在由英美等发达国家转变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从规模、方式、规则、机制化程度等各方面而言，全球化都在经历深刻变革。

因此，尽管英国“脱欧”会在一段时间内给全球化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影响，但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倡导的新型全球化则会给全世界带来很多发展上的确定性，全球化不仅不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还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更反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多元化。

总之，英国“脱欧”并不会让英国退回到所谓“小店主国家”的地步，反而会促进英国转变参与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方式，这也给包括中国在内众多新型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英国“脱欧”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全球治理机制体系和世界合作秩序发生重大变革，欧洲乃至世界或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忍受转型所带来的苦涩和阵痛，但这其中仍蕴含着创新全球合作的丰富机遇。

热点透析

特蕾莎·梅将把英国带往何方

作为英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转折点的首相，特蕾莎·梅能否站在历史的高处，重新定位英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和作用，有效整合全球新的资源，创造新的价值，将决定英国能否至少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和国际地位，甚至扩大自身的全球影响力。



特蕾莎·梅

□ 宋雄伟

2016年7月13日，继“铁娘子”撒切尔之后，英国产生了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蕾莎·梅。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她，沉稳、低调、干练，且具有强大的领导力，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四朝元老。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她就一直是保守党内部的核心成员。2010年以来，特蕾莎·梅就担任英国政府的内政大臣，协助前任首相卡梅伦处理事关英国国民安全的移民、边境控制，以及国内警察改革等重大议题，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行政经验。然而，特殊的历史时期注定她的首相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她将会碰到哪些主要议题，又会有哪些潜在的困境和危险，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分析的重要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英国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

首相之路

2015年英国大选时，时任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向英国社会公众承诺，将由民众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来决定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赢得选举后，卡梅伦按照承诺做出了时间安排，开始了各方的角力。最终，2016年6月的公投，令不少人感到震惊，英国人最终选择了离开欧盟。这场玩大的“脱欧游戏”既有必然性，更带着强烈的偶然性。

然而，这也将特蕾莎·梅的政治生涯推到了顶峰。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后，卡梅伦当即对外宣布辞职，并等待新的保守党领袖产生，正式移交首相权力。通常来讲，这一过程往往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从保守党党内候选人提名，组建团队，提出口号，进行辩论，党内选举，确定新领袖是一个较为激烈和漫长的过程。然而，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伦敦前市长鲍里斯（Boris Johnson）甚至在还没有正式开始竞争前，便宣布退出保守党领袖竞争。另外一位竞争对手利德索姆（Andrea Leadsome）在竞选中本有一定的希望，但她的策略严重失误，引起了党内成员和英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她攻击特蕾莎·梅没有子女，不可能真正对这个国家产生责任感，也不能够真正体会普通公众所面临的生活窘境和难处。这种攻击策略显得非常低级。在外界持续的谴责声中，利德索姆仅坚持了不到3周时间就宣布退出竞选。可以说，是历史的车轮将特蕾莎·梅迅速推上了首相宝座，她即将面对的也是任何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复杂情况。

特蕾莎·梅的主要议题

7月13日傍晚，特蕾莎·梅正式入住唐宁街10号，开始了英国政府的新时代。然而，这位女首相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产生的，也意味着她所面临的主要议题也会富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特蕾莎·梅的主要议题将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议题一：应对英国“后脱欧时代”的复杂局面。在特蕾莎·梅的应职演讲中，她提到，“脱欧就是脱欧”（Brexit is Brexit），尊重英国多数选民的决定，带领全体人民一起为英国寻找新的定位和方向，在后脱欧时代赢得英国的战略主动权。虽然，特蕾莎·梅在公投中是坚定的留欧支持者，但成为首相后，她所履行的责任是将脱欧进行到底。尽管数百万人在脱欧后搜集网上签名，要求政府重新考虑与欧盟的关系，甚至要求进行第二次公投。但这都不在特蕾莎·梅的计划中。接下来留给特蕾莎·梅的时间并不多，什么时候启动程序，先谈哪个领域，如何兼顾各方利益，以及如何与非欧盟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等建立新型贸易关系，各种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逻辑链条。稍有大意，便会使她领导的英国政府处处受到掣肘。

议题二：运用“什么理念”，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英国政府。特蕾莎·梅在保守党任重要职位多年，深受保守党历届领袖和其执政理念的影响。对于她来讲，运用“什么理念”，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英国政府是既需要向保守党回答，也需要向英国民众回答的核心问题。她在就职演讲中提出，“国家不能仅仅服务于那些少数派，更要服务于我们每一个人，还要给民众更多的生活自主权，共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英国”。这向我们透露的信号是“中间路线”，即她会尝试从“左”和“右”的保守主义分歧中寻求平衡，也为保守党2020年的英国大选慢慢铺垫。然而，政治口号总是容易脱口而出，特蕾莎·梅的智慧需要体现在如何系统性的谋划政策方案，赢得内阁全体支持，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英国民众感受到她的理念。此外，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英国政府更需要她的领导力和行动力。

议题三：怎么样更好地推动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特蕾莎·梅的就职演讲中有一半篇幅的论述与公共服务紧密相关。她谈到了社会不公、公立学校、就业、收入分配，以及住房等重要议题，而这些全部都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历届英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的议题，对于特蕾莎·梅来讲同样也是施政重点。然而，历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区别是在“怎么样”建设的问题上。究竟如何同时发挥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也一直是英国政府所探寻的基本问题。卡梅伦在公共服务上围绕“大社会”理念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评价喜忧参半。笔者以为，特蕾莎·梅将会延着卡梅伦的基本思路继续在公共服务供给改革上投入较多精力。

潜在危机

特蕾莎·梅的首相之路看似一帆风顺，却也隐藏着不少潜在的危机。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需要她的勇气和智慧，更需要防患于未然，避免潜在的危机和困境。

危机一：后脱欧时代可能面临的英国内部分裂。英国决定脱欧后，苏格兰政府的反应最为强烈，除了理念方面的原因外，最大的恐惧来源于经济利益。如果脱欧，苏格兰将会从欧盟失去一大笔资金援助，这将使苏格兰本就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特蕾莎·梅成为首相后随即奔赴苏格兰会见第一首相、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施特金，承诺要在与苏格兰等地区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且产生符合英国整体利益的“英国方法”时，才将正式启动脱欧程序。然而，什么是“英国方法”是很模糊的。苏格兰长期以来独立的呼声一直很高，现任第一首相2014年也是坚定的苏格兰独立支持者。因此，笔者以为，脱欧过程中碰触到苏格兰敏感神经的机率大幅增加，稍有不慎，可能会引发苏格兰独立的第二次公投。

危机二：平衡保守党内部的“左右”之争。保守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是历届保守党领袖尝试努力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卡梅伦的脱欧公投其实是对保守党内部右翼势力的一种妥协。同样，对于特蕾莎·梅来说仍然面临这样的挑战。从现在内阁的构成来看，新一届内阁中共有24位成员，留欧派占71%，脱欧派占29%。这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岗位皆由脱欧派来掌控。比如，大卫·戴维斯任脱欧事务部部长，前伦敦市长鲍里斯任外交部部长，福克斯则被任命为国际贸易部部长。在实际脱欧进程中，由于他们强烈的脱欧动机，可能会打破保守党内部的平衡，形成新一轮的“左右”之争，从而破坏内阁的团结。这个问题对于特蕾莎·梅来讲是潜在的定时炸弹，不可小视。

作为英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转折点的首相，特蕾莎·梅能否站在历史的高处，重新定位英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和作用，有效整合全球新的资源，创造新的价值，将决定英国能否至少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和国际地位，甚至扩大自身的全球影响力。特蕾莎·梅的任务很重，压力不小，我们拭目以待，她会将英国带向何方。